

· 《梦幻与现实》三部曲 ·

王宝成
著

心境

陕西人民出版社

·
《梦幻与现实》三部曲
·

心境

王宝成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境/王宝成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ISBN 7-224-05345-6

I. 心...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4702 号

心 境

王宝成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 印张 4 插页 38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224-05435-6/I·1047

定价: 25.00 元

你写的书，让我不敢轻率翻揭

陈忠实

1

时令正当关中平原的早春时节。细雨把一缕缕让人感到滋润的气息送进窗户，微带寒意。窗外的高架桥上交错着连绵着汽车的灯火。听着作家王宝成随心所欲的谈话，悠悠的沉沉的语调，总是让听者的我摆脱不开一种沉重的心绪，然而在这沉重里，我强烈地感受着一个在苦难人生中跃进着的生命，一个咬破嘴唇吮吞着唇血而又不哭不诉的汉子。

这个汉子和我不隔着一个床铺，面对面坐在竹椅上随意聊着，话头儿竟是这样提起的：村子里父辈的人一个接一个死去了，剩下没有几个了。我突然发觉自己有关那些生活的记忆，随着人去而空泛了……这显然是切入生命深层的体验，而非一般的生活咏叹。我的心灵深处微微一颤。

许久许久了，我们生活在这座曾经辉煌于中国历史的古老城堡里，虽然很少串通、走动，下意识里却是一种无需表述的信赖。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常常见面常常谈话常常吃喝常常勾肩搭背，然而放下酒杯松开握着的手，便什么也没有了；有的人如王宝成这类，一年里见不上三回两回，见了面也未必亲热亲昵甚至有点冷冷的人，我却有一种踏实永远的信

赖；生活是万象的，即使活到这个年纪，仍然悟不透这个最普遍的生活世相。

2

王宝成的名字和中篇小说《喜鹊泪》是同时进入我的记忆的。刚刚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陕西文坛和刚刚蓬勃起来的中国文坛一样蓬蓬勃勃，时不时便有一个陌生的名字突然在文学界爆响，你无法料知陕北的黄土高原陕南的秦巴山地汉水流域和渭河平原的古老关中，那里正有一棵文学之树于某个黎明拱破土层摇曳在晨风晨光里。我经历过那个令人惊诧令人振奋的好时月，那是过去的历史和往后的现实都不曾发生也很难重现的一种奇异的文学现象。恰如解冻后的原野上草木的复苏，而文坛的冻结要比自然界严酷而且继续了十余年之久。我记不清在什么场合听到王宝成的名字，说他有一部中篇小说在上海的《收获》发表了。看过的人说写得相当好，作者是省委机关的一位干部。《收获》在“文化大革命”前是惟一的一本大型文学双月刊，在我心中有着一种难以高攀的位置，这个王宝成一出手就跃起到这样一个高度，真是令人惊羨。回到我供职的灞桥文化馆，便找来 1981 年 5 月号的《收获》读《喜鹊泪》，这个小说和作者王宝成便铸入了我的记忆。

现在，我和王宝成隔一个床铺对面坐着聊着。他比我小一二岁，鬓发虽也露白，然而毛发却比我稠密，令我羡慕。他说那个《喜鹊泪》原是听来的故事，是和他在一栋办公楼里工作的省妇联的同志告诉他的，关于陕西周至县的终南山区一个女孩子殉情的惨事。他起初听到时并没有引起创作的欲望，尽管妇联干部很动感情地对他叙说。又过了些日子，妇联干部把那

一个女孩殉情时留下的遗书给他看了。正是这一封遗书，一下子触及到作家的某一根神经，搅起了情感世界里的波澜，他被一个乡村女孩的纯洁而又凄惨的爱的情愫感应得坐卧不宁，当即赶赴终南山下的黑水河边，寻觅遗落在那里的有关一个乡村女孩的情丝爱絮……《喜鹊泪》诞生了。

我听着这个故事，并不太惊奇，每个作家的任何一部成功之作，都有诱发其创作的最初的因素。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恰好是故事之前的种种奇特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触发作家创作冲动的诱因。一个为了挣脱包办婚姻为了争取真爱的乡村女孩为情而死的生活事件，虽然动人却终究有点陈旧，毕竟都 80 年代了，王宝成发生不了创作冲动是合理的。然而那封遗书中的几句话，仅仅是其中的三两句话，却把一个七尺汉子的心灵和情感之湖颠覆了，一个作品便在这一瞬间如同受孕一样奇异地发生了。作家凭什么感知生活感知世界，或在说生活以什么形式或方式去触发作家心灵从而引起波澜，实在是无法预测无法期待也无法钦定的事。作家自己往往也很难料知很难把握，看似不经意间的一种感应一种触发而产生的受孕的效果，往往正可能是一个独具个性的艺术生命的诞生。

3

我读王宝成的作品，无论是中篇《海中金》《故乡麦月天》《父亲·母亲》等，无论是长篇小说《梦幻与现实》三部曲，总会产生一种阅读自己的感觉。我曾经多次在阅读中掩卷思索，这种感觉是怎么产生的？

是我们都生长在渭河平原相同的经济形态和相同的文化氛围中？似乎也不大可靠，因为我们的个人经历中的差异还是很

大的，再说在同一块地域上的作家还有许多，为什么在阅读王宝成作品时会产生这种独有的感觉呢？我终于排除了那些客观的容易产生简单化解释的因素，最终归结到王宝成作品本身。

无论中篇或长篇小说，王宝成呈现给我们的文本，首先以其不可置疑的巨大的真实感直接撞击人的阅读神经。作为读者的我便在那种真实真切的生活图景里完全顺从了，顺从地领受生活的一页斑斓一页泪痕乃至一页污浊；而这一页一页文字所描述的昨天或今天的记忆和景象，恰恰是我经历过承受过也体验过的难以忘却的精神履痕。阅读这样的文本自然会使沉寂了的记忆重新掀起波涌，而且不是简单的重复和重温，而是一种新的咀嚼的快感，是一种回眸来路的感叹和领悟。真正优秀的文学给人的最基本的阅读满足正在于此。

我在阅读《父亲·母亲》时常常忍不住泪眼矇眬。一个渭北高原最不起眼的土坯屋里流荡着人类最动人的情和爱的大劫，一个关中大汉（父亲）在这种大劫中压抑着灵魂的咆哮承受着走到今天，一个幼稚的生命（儿子）在这种大劫中把哭声转变为沉默、刚毅、正直走出自己的人生，而把这镶嵌在黄土坡坎下的土屋里美丽的人性的东西双手掏捧给今天的人们：我经历了苦难，我经历了成功，我没有被碾压成尘，我终于获得了陈述过去的权利和能力。

王宝成小说的不可置疑的真实感源自他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我在阅读《父亲·母亲》、《故乡麦月天》等中篇小说时，曾经不断发生疑问，这可能甚至肯定就是宝成自己和亲人们真实发生过的生活故事，我在阅读长篇小说《梦幻与现实》三部曲的时候，仍然不断泛起这种联想，企图猜想原有的生活素材和虚构的故事所占的成分，那个经历过极度贫穷经历过亲情割

裂又心地纯洁的蒲冬林身上，印证着宣泄着作家王宝成的多少真实的情感份额，我曾经企图把这两者分离出来，探究宝成怎样完成从生活到艺术的奥秘，难得很，终无结果。现在，2000年早春的这个夜晚，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十年前的这种强烈的阅读疑猜得到了验证，宝成坦然地说，所有这些作品，都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

文坛常常呈现纷繁的创作现象，作家面对生活进行艺术创造时也是各怀绝技各种套路，本属正常。然而，在真实的树和虚拟的影之间，却有一个难以混同的界线，有的作家面对的是一棵真实的树，有的作家却着意于那树投射到地上的影子。王宝成不仅始终面对着那一棵绿树，甚至那树就扎根在他的心灵和血液里，不可能推开树本身而去追逐那个影子。

真实的艺术效果来自真实的生活体验和升华到理性的生命体验。王宝成不仅有一个巨大的蕴藏，而且具备了开掘和表述这种蕴藏的独具个性的艺术创造能力。我不想在这篇短文里作艺术评价，只是感到遗憾，文学评论界往往也发生追逐影子而忘记了真实的绿树的现象。然而这亦不值得计较，影子的变幻和消失终究是难以改变的，而结结实实的绿树却是愈见其强劲的风姿的。

4

两年前的隆冬季节，我在渭北高原的蒲城县住过一周。朋友带我去参观杨虎城将军的故居，又参观王鼎的故居，我一时感慨万端。在鸦片战争的民族大屈辱里，陕西蒲城人王鼎力荐林则徐，向清帝做出了死谏的举措；在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还是陕西蒲城人杨虎城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兵谏的举措，结

局亦难免惨死。我在参观他们相距不远的两座故居时，总是由不得慨叹，这块土地出产硬汉，这块土地的土质和水质滋养硬汉，铁的嘴，钢的牙，血的性，热烈而又刚毅，正是关中人的典型代表，正是一个民族的良心和脊梁。

怀着这种强烈的慨叹，走到一条街巷的小学校门口，朋友告诉我，这是王宝成的母校。我的心又一次怦然而动。我竟然产生了幼稚的童趣，企图寻找少年王宝成的足迹和读书写字的课桌，然而这个小学校已经搬挪一空了。这所小学的前身是清代的一个“考院”，整个渭北的秀才们考取文举人的一个考场，规模庞大气宇不凡，似乎仍然可以感受满室秀才笔试的肃穆和严峻。解放后改为“东槐院小学”的这个浸淫着秀才们墨香和泪斑的屋院，却成就了一位优秀的作家。

我无法想象少年王宝成的举止和情态，眼前清晰地映现着一张黝黑的方脸，浓发浓眉，沉静到使人容易错觉为呆滞的眼睛，悠悠地说话，诚挚到略显羞涩的笑。我甚至瞎想，如若王宝成处在王鼎的那种历史境遇下，同样会把自己的七尺之躯挂上那一条白练的。

大约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正值我的家乡灞河川道的鹿原地区的夏收时节，我和王宝成坐在灞河岸边的河堤上，看农民在收割麦子，河岸两边的绿树和青草散发的清香和麦田里的香气混合着弥漫在空气中，夕阳灿灿。我们坐在沙堤上，同样是随心所欲地闲聊着。他正在写作一部电视连续剧，躲在距我家不足五里的一个驻军的招待所里，便有了这次相约相聚。

十年后的今夜，我和宝成坐在这家城郊的宾馆里，主要听他说话。这个人曾经把每天定量的馍馍换了一本小说书，整整两天没有馍吃而饿昏在回家的庄稼地边。不是战争，不是灾

害，仅仅只是贫穷。在贫穷和困境里因为渴望知识而能产生这样的承受力的少年，恐怕什么挫折和灾难也难摧折其高远的心态，也难扭曲其刚直的脊骨的。少年时代一旦具备这样的生理到心理的承受苦难的毅力，足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五十五岁的王宝成现在以一个智者的沉稳和透亮的口吻对我慨叹：“骨髓里的东西是难以改变的。”

5

许多年以来，王宝成生活在古城南郊的大雁塔一侧，不声不吭，文人聚会和新闻传媒上很少能见到他的行踪，只有新的作品在杂志或屏幕上出现的时候，才出现在读者和观众的视野里和言谈里，之外便什么举动都没有了。

这个人从来没有过炒作，他炒没有，自炒更没有。他不事张扬，更不会自我膨胀。他面对的始终是书桌，始终恪守着一个作家的真实的为文和为人之道。出于对创作这种劳动的本质性理解，作家是以自己的作品和读者完成交流的，非文学的手段对于作家和作品不可能产生稍为长久的补益。面对屡屡潮起的浮尘式的文坛现象，他至多一句叹惋或轻淡的一笑，该做什么还继续做什么去了。

我还是对王宝成的创作有更多感触，这人写了多少优秀作品啊！电视剧《喜鹊泪》不仅使乡村青春男女激起强烈共鸣，同样使城市里更趋现代意识的年轻人感受到心灵和情感深处的某些胎记的东西。《庄稼汉》和《神禾塬》的成功，我更清晰地看到宝成的笔尖所指，愈来愈集中愈来愈专注于关中地域性的人的心理结构和文化蕴含，以透视和解析这个民族精神更新的艰难和痛楚。他的小说从中、短篇写到长篇三卷，排列起来是一个令

人惊异的雄壮的阵式，当是多年默默地耕耘所得的不俗的收获。这种收获才足以使一个创造者产生充实和自信的良好心理情绪，也足以面对纷繁的社会和同样纷繁的文坛轻淡一笑。

如果要叫我进行选拔，这将是十分困难也十分令人做难的事。王宝成的作品几乎没有同类题材和同类意旨的并列性表述文本，每一篇或每一部都是意向迥异的开掘和探求，比较和选择在同一类型间可以进行，而不同类型的选择和比较往往造成选择者的兴趣和所好的暴露。我只能从阅读的直接感受来说这些作品，中篇系列里的《父亲·母亲》当是一颗咀嚼不尽的柠檬，那含混着甘甜酸渍苦涩的汁味，留下的是人生的复杂而又绵长的记忆。我曾经和朋友们不止一次闲聊过这种阅读感受，多有同感，且以为在80年代的当代中篇小说里应该是一个重要收获，被评奖机构尤其是被评论界的忽视当是一个遗憾。评论家李星的一句很概括的表述令我欣慰：《父亲·母亲》可与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媲美。可见好酒还是不怨巷子深的。而《故乡麦月天》留给我最初和最终的印象，依然是诗性的，是一篇深沉得令人不敢轻率翻揭书页的中国乡村的土地诗篇。由此我曾联想到连结婴儿和母亲的那根脐带。脐带的绝对温馨的意义和斩断它的毫不含糊同样是绝对的意义，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必然的痛苦。王宝成不仅是面对，更多的是亲历这根脐带被剪断的痛苦时，发出的声音是那么撼人心灵的真实；美好的传统和不容置疑的剪断所引发的复杂的心理剥离的痛苦，是他独特的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的成功展示。同期同类乡村题材还多停留在农村政策变化的生活浅层故事的编排和演绎上，王宝成却早已透过那个顽固的图解政治注释政策的写作怪圈，进入原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的层面了。

6

真正体现王宝成艺术个性和创作才华的还应该是他的长篇小说《梦幻与现实》三部曲。我看到第一部《爱情与饥荒》的第一眼时，在振奋的同时也潜伏着某些羡慕甚或妒忌的东西。我那时正在长篇《白》书的写作中，初试长篇小说的惶恐和对前景的种种担忧，有一种持续数载的无法挥斥的空虚。见到宝成刚出版的长篇，自然企盼自己案头的那一摞墨痕新鲜的稿纸也能变为这么厚厚的一本，该当是怎样令人舒展欢悦的时刻。王宝成不声不响，《爱情与饥荒》写作顺畅出版顺利，真是令人羡慕以至妒意潜生了。

从1987年新年伊始动笔，历经整整十二年，宝成完成了百万余言的长篇三部曲，才是真正令人羡慕以至妒忌以至钦敬的事了。

对于同代作家，尤其是面对可以称为朋友的同代作家，对他们杰出的创造成果产生羡慕心理恐怕是正常不过的事，产生钦敬的心理应该是高尚情怀了，然而混淆其中的妒忌心理是否正常呢？我以为就我的亲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记得在80年代初路遥的《人生》发表时，我的阅读直感就是这样，似乎猛乍发现同场长跑的路遥已经超出自己一圈了，由此而产生的羡慕、钦佩之情里，很难排除某些不太光彩的又绝难出口的妒忌。阅读《爱情与饥荒》时，也产生过这种情绪，即妒忌。这个黑黑脸膛又不吭不响的王宝成，这个长篇写得多好哇，深刻的独特的体验和沉稳扎实的叙述功夫，把一个几乎与作家难分难别的蒲冬林推到我的面前时，我才切实地感觉到《父亲·母亲》的写作仅是艺术锋芒的初露，其璀璨的光芒只有到《爱情与饥荒》这部长篇中才展现出来。羡慕、钦敬以至令人闻之喷

鼻的妒忌就都产生了。

我不敢猜测别人，只是老实承认自己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然而我却以为这个令人嗤鼻的妒忌还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效果，那就是重新审视自己，从虚妄和盲目中清醒过来；尽快地把盯着赞美性文字的眼睛移开，把翘起的尾巴收住甚至斫掉；把心理调整到沉静，以冷静到冷酷的心肠强迫自己重新审视以往的一切；调整步履也调整笔锋，在找到新的艺术目标的同时，也对自己的起点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定位。这情景同样类似于赛跑，眼见比自己跑得快的同类伸脚使绊子，是妒忌这种作为人类不健康心态最易发生的举动；然而，如果把妒忌转化为内省自审的契机去审视自己的腿和脚，就可能在下一届竞技中重新超出。何况文学创作不完全类同于体育竞技，而更应属于自己体验的展示。

我很难也不可能在这篇散记式的文章里论述百万言的三卷本长篇巨著。我只是要告诉宝成，我的羡慕、钦敬和妒忌又发生了。长跑线上总是对那些比自己跑得快的同类才会发生这种情绪，同代又同地的作家当然是那些优秀于自己的创作才会产生这种复杂心理。历时十二年完成《梦幻与现实》三部曲，在王宝成是一件可慰终生的成功，终于把自己的文学之梦变成一组磅礴的群雕。蒲冬林等人物的生活之路和心灵历程，正可以当做半个世纪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来回嚼。

面对我的朋友王宝成和即将出版的《梦幻与现实》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心境》，我在祝福的同时，又一次感到该当重新审视自己的“腿和脚”了。

2000年4月11日

于汉中

第一章

也许在冥冥上苍的眼里，所有的人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芸芸众生，人世间的一切只不过是一种生命的流动过程。但是，对于每一个生命个体来说，生命现象却是漫长的，艰巨的，同时充盈着无穷无尽的痛伤、意趣和欢乐。

一根细长的灯线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系着一个戴有伞形铁皮罩的灯泡，灯泡支数很大，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灯光下，几个人围住办公桌玩纸牌，喊三叫四，吆五喝六的，正在兴头上，一位短辫姑娘抱着厚厚一摞刚打印好的材料跷着碎步走进来。

“快，把扑克收拾起来！”

“等会儿，这盘马上就完了！”

姑娘将材料往扑克牌上一压：“哎呀，啥大不了的事儿，还是先揭这些大牌吧！”

打牌在一片唏嘘声中暂停下来。

于是，这些散发着油墨气味的材料就像大扑克牌一样，很

快被按页码次序一叠半压着一叠成马蹄形排列在三张并在一起的办公桌上，牌场很快变成了装订文件的手工作坊，三个人拣页，一个人整理，一个人装订。这整理和装订倒也平常，惟独这拣页看似简单，其实里面埋藏着很多奥妙，技术要求很高，他们各人半猫着腰往前走着抽页，走完一圈，就拣好了一份，接着来第二圈，第三圈，一个紧跟着一个；捻页，抽页，蘸唾沫，挪小步，天衣无缝地连贯成一系列熟练的动作，既要速度快，又不能出现重页、缺页和倒页。对于这里的每一个人来说，做这种活儿就像农民收庄稼，早就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的了，何况中间还不时地夹带着一些笑料和怪动作，竟有点乐此不疲的光景。不出一个钟头，这份三十多个页码的材料就变成了上百份省级红头文件，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儿了。

赵德发从墙角抱出一厚叠牛皮纸信封，咧着胡子拉碴的嘴巴笑着说：“冬林，还是你写信封，我们装。”这个形神兼备的工农干部干起什么活儿都像上了瘾，总想一口气把眼前的事情全做完。田景顺把他连同怀里抱着的信封一起推回墙角：“说你是老革命，你还真的革起命来啦？”老赵还想坚持，被田景顺促屁股窝进墙角里。

“继续革命放到明早，现在继续打牌！”田景顺笑着扫了两位姑娘一眼，“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革命导师的话都忘啦？”

赵德发从信封堆里爬起来，指着田景顺，咧开胡子茬茬嘴巴哎了半天，也没哎出一句话，嘿嘿笑着走回了牌桌。

有了打字员刘玉琴，蒲冬林可以从牌场退出来了。他坐在东墙根下属于自己的那张办公桌前，打开翠绿玻璃灯罩的台灯，点起了一支黄金叶香烟，一边顺手从抽屉里拿出那本好不

容易才托人从省图书馆弄出来的《死冤家》。对他来说，如今读文学作品只能是一种业余爱好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他历尽千辛万苦完成了十七年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和全中国所有六九届毕业的大学生一起等待了一年分配，又到解放军农场艰苦磨难了一年半以后，竟然被命运安排到这样一个和他所学的专业不大相干的省府机关大院里来。当然，在一般人眼里，这儿是一个伸手想够也够不着的好去处，但对他，直接的感觉却是把麦苗插进了稻田里。这儿没有屈原，没有杜甫，也没有蒲松龄和曹雪芹，更没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有的只是照章办事的干部和官吏。他这样的环境里已经呆了五年，这五年给他的总体印象是这座行政办公大楼有点像一种特殊的加工厂，加工出来的产品就是各种各样的文件，他们刚才所做的就是完成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剩下的就是将这些文件装进信封送到机要处，再由机要处用汽车运送到邮局，然后分发到全省各地县、各单位。在这里，掌握实权的自然是各级行政长官，但文件的形成则主要是依赖各职能部门数量有限的笔杆子。这些笔杆子每天要阅读大量的上级文件、首长讲话和中央报刊，同时要依据本系统的工作特点做大量的实际调查，然后根据部门领导的指示和意图起草文稿，又经反复修改，最后形成正式文件。他们中间有些杰出者虽然没有什么显赫的职位，但被视为部门乃至省上的重臣，可以享受到一种类似无冕王的政治待遇，于规范、辛劳甚至委屈中寻求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精神满足。蒲冬林虽然尚未达到此种境界，但已被视为他所在部门的笔杆子之一，这多少有点不幸，因为他并不十分精通此道。在根据领导要求起草一份文件时，他不大习惯于字字句句出自有据，他总是企图加进自己的某些想法，甚至在行文过程中喜欢

夹带上一些富有感情色彩的字句，而这正是行政公文的大忌；所有这些非公文式的彩色文字，当领导审稿时，都会被毫不留情地全部删去，就像当年苏联卫国战争时，真理报主编笑着删去西蒙诺夫起草的评论员文章中的类似词句一样。“他笑着对我说，你这文章，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西蒙诺夫写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笑着对人说话。我这才明白，报纸的社论和评论要写成让读者无法辨认出是谁写的那样……”西蒙诺夫写在回忆录里的这段话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早就意识到自己不是搞政治的料，他一直希望能去到一个什么文艺单位，至少是文化部门，以发挥他的专长，但多年动乱已使文化园地一片荒芜，很难谈得上这些，至少在眼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设法搞一些被尘封在图书馆里的书来读，同时耐心地等待时机。

差不多已经快十年了吧，他的生命旅程几乎一直是在等待。先是说“文化大革命”只需半年，他就一直等待复课闹革命，越等希望越渺茫；然后是等待中央解决金州地区的文革问题；以后又是等待建立各级红色政权，等待毕业分配，等待如火如荼的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结束，分配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再后来又是等待专业对口。对他来说，每次等待都是一种长时间的生命的消耗，都是一种需要有极大忍耐力的精神的煎熬，然后才能换得从人生道路上迈出的那么小小的一步。现在，他已经是三十出头的人了，却还是在等待，等到什么年月才能找见自己人生的位置呢？高中一年级时他对自己前途的设计和预测是最迟在二十七岁前就要有所成就，而立之年多少总要有点了不起，现在呢？他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成年的自慰，甚至觉得自己的人生还没有正式开始，如此这样等待下去，莫非